

学报编辑三编江泽民学术论文

时过一个多月,龚汉忠仍然对2月28日的那个夜晚印象深刻。

那一夜,位于上海交大图书馆15楼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编辑部,在接近凌晨时仍然灯火通明。作为编辑部主任的龚汉忠和他的同事们,正面对着一篇特别的来稿。

这篇满是图表和注释的长篇学术论文是编辑部邮箱里刚刚收到的。它很快让这份发行量不过2000余册的学术刊物的编辑们陷入一片兴奋。

来稿题目是《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作者是江泽民——1947年的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生,中国党和国家的前主要领导人。

“鉴于这篇论文的分量和特殊性,我们决定赶在今年4月8日交大112周年校庆前把它发出来。”4月4日,龚汉忠向记者回忆说,“大家熬了很多个夜晚,对原稿前后进行了五六次修改。”

经过龚汉忠他们的精心编辑,江泽民的论文于4月初发表于2008年第三期《交大学报》(自然科学版),旋即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作为退下来的前领导人,江泽民的社会身份发生了改变,以新的身份来思索中国的能源问题,会有更新的视角。”中科院广州分院院长、广东省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陈勇评价说,这同时也是举国上下对中国能源问题的关注

和研讨迅速升温的一个标志。

编辑修改了五六遍

事情要回溯到2007年底。那时,恰逢江泽民从交通大学毕业60周年。交大主要领导向江泽民约稿,希望他为交大学报写点文字,作为献给2008年4月交大112周年校庆的一份礼物,江泽民欣然应允。

“江泽民对这篇文章高度重视。”龚汉忠告诉记者,写作这种长篇论文的工作量非常大,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写出来的。

2月底,江泽民完成论文,向交大学报交稿。

编辑部审稿后认为,这篇论文学术功底扎实、写作严谨、文中引用文献资料数目巨大、出处明白、行文条理清晰,看得出,江泽民退休后一直坚持相关领域的研究,有着丰富的积累。

随后的编校工作和外界通常的想象不同。“我们对原稿先后修改了五六次”,龚汉忠拿出厚达一厘米的批注记录给记者看,上面满是用红笔标出的修改和批注,“编辑部并没有因为江泽民学长的特殊身份而降低对稿件编辑的要求,一样进行了严格的质量把关”。

例如,江泽民原稿中的“二氧化碳”喜欢用中文书写,编辑部按照论文的一般要求,进行了规范处理。

这并不是龚汉忠第一次编辑江泽民的论文。这位在交大学报供职20余载的元老,早在1989年就经手编辑过江泽民发表在学报上另两篇学术论文,其中一篇也是探讨中国能源问题的,题为《能源发展趋势及主要节能措施》。

1989年3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回到母校,为交大师生做了一场学术报告,讲述当时在长三角经济发展中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的能源问题。

“江学长的报告很风趣,常常引起台下的笑声,报告的学术功底也很扎实,谈起晦涩的自然科学问题来深入浅出。”龚汉忠回忆说。

在这次演讲的基础上,江泽民整理出了《能源发展趋势及主要节能措施》一文。

随后稿件数次往返于编辑部和江泽民本人之间,经过了“很认真地修改”。“校样和清样上满是江学长的亲笔批注,他对学术论文非常认真,每个细小的数据、单位、英文标志都要认真核实。”对于编辑部指出的文中的个别差错,他会认真地批注表示感谢。

20年后的思考更深入

事隔近20年,当退休后的江泽民再次在交大学报发表对中国能源问题的观点时,他的思考比20年前更加宏大和深入。

在《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论文中,江泽民强调指出,“能源安全中,最重要的是石油安全”。国际石油市场的稳定,对中国的能源安全、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他希望通过开展国际合作,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包括鼓励企业“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开发能源资源,增加石油天然气供应能力”。

同时,文章指出,中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传统发展模式,而要探索新的发展路子。要将节能优先作为我国能源问题长期的战略,并分别从工业、交通、建筑等诸多领域提出了对国家节能政策的具体建议。

对于时下全国上下关注的能源税、能源价格等问题,江泽民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资源税对调节开发企业和资源产地的利益关系、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其征收标准应当继续合理提高。燃油税、能源税等消费税种在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长期实施,促进了能效提高和技术开发,收到了显著的节能效果,有的国家还对CO₂排放征税。“这些政策可供我们研究借鉴。”

在文末,江泽民向为撰写此文提供协助的马富才、宁吉口、周大地、韩文科表示感谢。

马富才现任国家能源领

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宁吉口任职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周大地现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是他的副手。《交大学报》表示,这四人及有关研究机构向江泽民的论文贡献了为数众多的数据资料。

“文中的许多数据和资料是一般研究人员很难得到的,并且江所具有的战略眼光,也是许多学术论文难以企及的。”陈勇评价说。

还在2004年10月,江泽民在上海的家中就曾对老同学余力教授说:退休后不想别的事,想在学校里任教,也在做着准备工作。

“这让人想起退休后充当朝鲜问题特使的美国前总统卡特,以及最近一直致力于环保的前副总统戈尔。”陈勇说,此前,我国有多位前任国家领导人退休后以自己方式继续为国家和社会贡献智慧,李岚清出版了《李岚清音乐笔谈》,着眼于音乐知识普及,李瑞环出版了《学哲学用哲学》,而李鹏则出版了系列日记。

举国论能源

江泽民论文的发表使朝野上下关于中国能源战略的大讨论再次升温。记者获悉,一个中国能源战略研讨会将于近期在北京召开,江泽民本人可能出席。

鉴于江的特殊身份,这篇

论文引发的波澜显然不仅局限于学术界,它在当今中国所处的能源局势中传达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随着全球油价的不断攀升和国内能源需求的急剧放大,中国的能源问题日益突出。而在美元不断下滑、全球经济走软预期之下,投资者纷纷重返大宗商品市场寻求避险,石油等能源产品的市场局势更显复杂。美国原油期货周一在亚洲盘初持于每桶106美元上方,守住上周五逾2美元的涨幅。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所所长林伯强认为,有两个难题一直是中国能源问题的症结所在,一是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另一个是能源价格不能完全放开。

“要做到第一点,我们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能源价格,凸现能源的稀缺性,从而促使各种力量来推动节能高效。而第二个目标则要求政府要顾及多种利益的诉求。对于如何平衡这两个问题,国家一直在进行着思考。”林伯强说。

陈勇对江泽民论文中关于中国应对能源问题“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传统发展模式”的论述表示赞同:“我国在寻找解决能源问题对策的过程中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一味引进的话,就会把自己的市场都让给别人了。”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广州62岁老母亲冒险捐肾救子

孔福洪紧握着身旁这个给予自己第二次生命的母亲的手,发自肺腑地说:“还是妈妈好。”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对于这句流传千年的《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来自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白坭村的孔福洪有了新的体验。对于他而言,母亲给予他的不仅仅是几十年来生养之恩,而是常人难有的第二次生命。由于罹患尿毒症,急需换肾治疗的他,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肾源——62岁高龄的母亲任惠可。在接受移植手术一个多月后,妈妈给他的第三个肾,开始正常在他体内运作,尿毒症的相关症状已彻底消除。而这位伟大母亲的举动,也使他成为广州地区年龄最大的活体肾脏捐赠者之一。

7日,当记者在广州市四五六医院肝病中心临床部移植病区见到成功接受移植手术的孔福洪时,用主治医师刘洲的话说,这个35岁的汉子已是判若两人:“从入院时的身体虚弱,全身浮肿、乏力,到现在能下床自由行走、排尿正常、浮肿消除,他母亲的肾脏在其体内‘工作’得非常正常。”

壮汉患尿毒症透析续命

病榻之上的孔福洪告诉记者,他是在两年多前查出罹患急性肾炎的,很快就转变成了尿毒症。“就靠着一周进行一到两次的血液透析维持生命,费用非常昂贵,最便宜也要400多元一次。一年多下来,本来就不宽裕的家底被彻底地掏空了”。那时他一个星期起码要在病床榻上躺上两三天,重活根本无法染指,拥有一个正在上幼儿园小孩的家庭生活顿时困顿起来。

四兄妹家人均反对捐肾
在辗转两家医院治疗,透

析花光了自己的积蓄和亲戚朋友的借款共十多万元钱后,孔福洪的病情仍然没有进展。孔家后来打听到换肾可以解除病痛,于是决定走肾移植这条路。可患肾病需要换肾的患者太多了,通过正常途径取得肾源太难,而且费用太贵。此时,一个病友给了孔家一个建议——亲属间的活体捐肾。

今年3月20日,孔福洪转入了四五六医院肝病康复中心,开始寻求亲属间活体移植的可能性。

“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妹妹,在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兄弟姐妹们都表现出了要捐一个肾脏的意愿,让我十分感动。”可就在孔氏兄妹们准备进行配型检查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兄妹们都已成了家,来自他们各自家人的反对声不断,这也最终阻断了孔福洪从他们身上获取健康肾源的念头,“毕竟要捐出一个器官,他们家人的反对也是可以理解的”。

六旬老母决定捐肾救子

就当孔福洪几乎绝望时,62岁已然是白发苍苍的母亲任惠可站了出来。“孩子,你的父亲已70多岁,年纪太大了没办法给你一个肾,那么我来吧……”在向记者复述出母亲当时的话时,这个35岁的汉子双眼噙满了泪水。

当孔福洪向记者介绍治病经历时,他可敬的母亲就坐在旁边的另一张病床旁,慈爱地看着儿子。年过六旬的任妈妈外表看起来要远远大于实际年龄,谈起捐肾救子的事,老人的脸上一直挂着如同孩童般灿烂的笑容。

“看着他肿成那样,我心里很痛啊……”儿子所受的苦如同利刀一般割在母亲的身上。对于其他孩子的难处,任惠可老人表示深深的理解。



孔福洪紧握着母亲的手,发自肺腑地说:“还是妈妈好。”

“那么就我来吧,只要能救儿子的命,我什么都愿意!”听到她的决定后,无论是老伴还是儿女都表示反对,可老人的态度很坚决,坚持要求为儿子捐肾。

移植成功患者本周出院

“应该说,由于一直居住在农村,生活质量以及营养都不是太好,这使得任妈妈看起来显得比较苍老。此外,目前中国所开展的亲属供肾移植手术,惯例一般将亲属活体供肾者的年龄限制在18-65岁以内,任妈妈的年纪已接近上限。这些因素一度让负责手术的医生十分担忧,但在为她做了严格的术前检查和评估后,医院作出了合适手术的判断。”主治医师刘洲说。

也许是任妈妈的举动感

动了上苍,3月24日的手术十分成功,术后患者的恢复也很好,“就连器官移植手术后普遍存在的排异现象,也没有太多地出现在孔福洪的身上”,刘洲说。

在手术后的第12天,任妈妈已经拆线并可以下地活动,而孔福洪也仅余下一针没拆,本星期内就可以办理出院手续。刘洲告诉记者,虽然不了解广州地区其他可进行肾移植医院的情况,但考虑到65岁这一捐献年龄上限,以及该院多年来肾脏移植的统计情况,说任妈妈是广州地区年龄最大的活体肾捐献者之一是肯定不为过的。

能救我儿子,我很开心!

7日,记者在病床旁采访

了这位伟大的母亲任惠可。

记:是什么时候发现儿子生病的?

任:两年多前吧,当时他在乡政府做事,感到有些不舒服就和他老婆去了人民医院(检查),后来就发现(得病)了,他那时候天天躺在床上,全身都肿。看着他的样子,我心痛啊。

记:为什么这么大了年纪了要冒险去给儿子捐肾?

任:只要能救到我儿子我就很高兴啦,我什么都愿意做。我儿子很年轻啊,他还有个儿子,才3岁,我好可怜他。他爸爸又70多岁啦,年纪大了不能捐……再说自己捐可以省很多钱啊,而且医生说身体很好的,我只有62岁,不是说65岁才不能做吗?

记:听说你的其他四个儿女不愿给福洪捐肾?

任:他们不是不愿意,他们都是愿意的。但他们都是成了家的人了,有些事情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决定的,像他(指在阳台上站着的大儿子)自己想说,可媳妇不同意啊(笑)。他们听到我要捐肾一开始都不同意,后来知道可以捐都还是很支持的。我一直都是很自愿的,我能救我儿子,我很开心啦。

记:整个过程中你有担心过自己的身体吗?

任:倒不是害怕疼痛,或者捐出一个肾脏后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我忧心的主要是(如果)自己的肾不合适,这样孩子就得遭罪……

记:您现在的情况好吗?

任:这个右边(刀口)昨天刚拆了线,有点疼还有点痒,晚上睡不着觉。我们其实恢复得都还好,这个周末就可以出院了。不过(望着小儿子)昨天晚上他咳嗽,我很担心他啊。

器官移植专家:患者家属捐肾难过心理关

四五六医院肝病中心副所长、器官移植专家余宙耀介绍,肾移植手术是目前治疗尿毒症的最好方法,但移植手术器官供体严重缺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全球性问题。我国尿毒症患者每年新增12万人,而每年的肾移植手术仅仅有4000多例。亲属活体供肾移植手术是近年来国际上提倡的解决供体缺乏的有效办法之一。

但受传统观念影响,我国血缘亲属间的活体肾脏移植手术,做得不多。2002年全国进行的5000多例肾移植手术中,只有76例为亲属间活体肾移植,所占比例约为1.5%,主要就是可以提供活体肾脏的患者家属们的心理关难过……

“一般来说,一个功能正常的肾脏足以满足人体的正常生理需要,对于健康人来说,捐出一个肾脏是不会影响以后的生活的。关键还是要患者家属们能够转变观念,才能更好地推动这项工作。”余宙耀说。

■相关新闻

71岁老母亲捐肾救女

来自高州市的慈母夏苗曾于去年8月以71岁高龄之躯捐肾救女,同时她也是广东省目前最高龄的捐肾者。

夏苗老人的女儿苏红梅不幸于2006年初患了尿毒症,而苏红梅的哥哥姐姐通过配血检验都不相符,唯有母亲的肾符合要求,经过考虑后夏苗老人决定捐肾救女。医院经过慎重研究,认为老母亲身体尚好,可以施行手术。

2007年8月18日,医院实施了手术,历时6个小时,进行得非常顺利。9月4日,苏红梅的肾功能已恢复。目前,母女俩都已康复。

据《信息时报》